

· 文学史研究丛书 ·

晚清至五四： 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

杨联芬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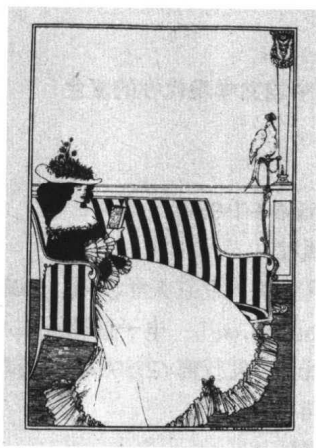


北京大学出版社

· 文学史研究丛书 ·

晚清至五四： 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

杨联芬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杨联芬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11

(文学史研究丛书)

ISBN 7-301-06566-3

I. 晚… II. 杨… III. 近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87012 号

书 名: 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

著作责任者: 杨联芬 著

责任编辑: 江 溶

标准书号: ISBN 7-301-06566-3/I·0649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2

排 版 者: 北京军峰公司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90mm × 1240mm A5 开本 10.625 印张 286 千字

2003 年 1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2.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序

严家炎

杨联芬女士的著作《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即将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她把书稿送来，邀我作序，我欣然答应了。

我认识联芬女士，是在九年前北师大中文系举行的博士论文答辩会上。当时的印象是：她有才气，肯下工夫，论文有分量，文笔也不错。留校任教后则联系不多。有时见到她在刊物上发表的论文，却来不及一一阅读。这次系统地读了她的书稿，作者在学术上达到的深度与广度，不免令我吃惊，我才意识到站在我们面前的，已是一位头角峥嵘、目光四射、相当出色的青年学者了。

这本著作并不全面叙述晚清到五四时期的文学历史，但却从发掘“现代性”的特定角度，深入考察了这一时期几个十分突出的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钩沉析疑，烛幽发微。就人们熟知的若干老话题阐释出极富启发性的新见解，中肯而又精警，很有学术价值。其中第三、六、七诸章，我认为写得尤其精彩。

晚清文学资料多而分散，长期没有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最近一二十年虽然出了一批重要学术成果，但相对而言基础仍较薄弱。而且，诚如作者所言：“阅读晚清小说，与其说是阅读文学，不如说是阅读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和历史”，往往会经历“一个极其枯燥乃至绝望的阅读时期”。可贵的是，作者在这种情况下知难而进，充分占有原始材料，敢于突破前人陈见，积数年艰苦努力，终于获得令人欣慰的果实。真正的研究工作决不只是“命名”，也不是对已有成果进行并无多少新意的“排列组合”，而是必须在学科领域内形成实质性的

推进。杨联芬的著作,我以为实现了这一目标。

就我的阅读感受而言,本书不是一般地讨论文学的现代性,它最出色的部分体现了三个特点:

一、进入历史的具体情境,充分体察历史本身的复杂丰富与多样。

以研究林纾的部分为例,作者具体考察了他用古文翻译一百几十部西方小说的情况以及他作为译者所写的大量序跋在当时环境中起到的作用;还搜集尽可能多的资料,论证他的译作对不止一代文学青年(包括鲁迅、周作人、胡适、郭沫若、李劫人、钱钟书等)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作者据实指出:“由于林纾深厚的文学功底与敏锐的艺术感觉,他往往对原著的风格,有深刻的领会。他用古文,竟然能够惟妙惟肖地传达西方原著的幽默,这已为众多现代作家所折服。”并认为:林纾“借翻译域外小说,为中国人打开了一扇通往世界的窗口,不但将西方小说推上新文学之师的位置,而且使小说这一样式悄悄蜕去‘鄙俗’的陈套,换上了‘雅’的衣衫。”这“正是那个时代调和雅(古文)、俗(小说),沟通中、西的最适当的桥梁”。即使“林氏的误读虽常常掩盖了西方原著的人文主义光彩,但却也是晚清那个时代广大士人阶层可能接受和理解西方的最好策略”。在作者看来,林纾强调中西之“同”,实际上提高了旧派对西方的认识:“一是让他们认识到西方文学与中国文学是相通的,‘勿遽贬西书,谓其文境不如中国也’;二是让他们知道西方人与中国人有许多相同的人性与人伦,并非无父的野蛮人。”如果“我们多少能够体会晚清文学转型的艰难,对林纾的误读也就多了几分理解”。

对于林纾与五四新文学家的论争,本书也作了深入的考察,连钱玄同、刘半农借虚构的“王敬轩”“设陷阱让林纾上套”这类细节都注意到了。作者不但指出林纾性格狷介真率、拒绝袁世凯的拉拢,也介绍了庚子年间他在杭州“作白话道情,颇风行一时”的事实,从而如实地得出“林纾与新文化的分歧,并非是否使用白话,而是是否使用白话就一定废除古文”这一结论。作者认为:“以五四激进主义为视角

的文学史,由于‘省略’了一些偶然事件的细节,一方面这个过程被简化,另一方面这场带有很强策略表演的论战,在历史主义的梳理下,带上某种虚假的崇高色彩;在这种色彩中,林纾的形象是扭曲的。”但作者又认为,指出“五四一方”存在“为求‘实质正义’而牺牲程序正义”的现象,“不是要对‘正义’的结论进行否定,而是尽可能在解读历史进程的某种偶然性或非理性时,对历史有一点更丰富和博大的理解”。这些看法都是比较公允和令人信服的。

二、良好的艺术感觉,富有灵气的文字表述。

例如,对晚清重要作家苏曼殊的论述,就颇得其神韵和气质。苏曼殊是一位极富才情、极有个性的作家。他是中国最早译介拜伦、雪莱的人。他的小说创作既开了“五四”浪漫主义的先河,也影响过民国时期的鸳鸯蝴蝶派。作者结合苏曼殊的独特经历和艺术渊源,对他的诗给予了切中肯綮的评价:

……这是一个典型的伤感的浪漫主义者形象。“契阔生死君莫问,行云流水一孤僧。无端狂笑无端哭,纵有欢肠已似冰。”(《过若松汀有感示仲兄》其二)洒脱与豪放之中的孤独、忧郁,活画出曼殊迷人的魅力来。曼殊的诗,尤其是那些书写离愁别恨、感慨飘零人生、记载爱情的诗篇,“其哀在心,其艳在骨”,雪莱式的幽深缥缈的品格,最令五四浪漫青年倾倒。

作者指出:“从意象、用典看,苏曼殊是古典的;但从表现的真诚、大胆,感情的纯洁看,苏曼殊的诗是现代的,充满了拜伦式的浪漫情怀,也具有雪莱式的感伤和细腻。”关于苏曼殊的那些中篇小说,作者认为代表作应该是《断鸿零雁记》,“最大的价值就是它完全颠覆了传统小说的叙事模式和理念。它不再像传统小说那样,以情节叙述为中心,追求对人的外部生活情境的真实模仿;《断鸿零雁记》采用的是诗化的叙事,它的语言是主观表现的,追求的是对人物心灵的表现。我们通常说,五四小说完成了中国小说由讲故事到表现(向内转)的现代性转化,……但它的发端,却不能不追索到民国初年的苏曼殊的

小说《断鸿零雁记》”。“从《断鸿零雁记》开始,中国小说中出现了一种飘零者形象。”作者上述艺术感觉和艺术判断,不能不说都是准确而符合实际的。尤其重要的是,作者还指明了苏曼殊的特殊性:“与同时代的其他从事文学的人相比,苏曼殊的文学活动最接近自然和‘非功利’,这与晚清以来的主流启蒙文学是不一样的。也正因此,他的作品在启蒙派作家那里,始终不会有太高的评价——除了少数朋友陈独秀、章士钊等。但他的浪漫主义风度,却赢得了多情善感的(五四)年轻浪漫派的认同。”对于我们理解苏曼殊的文学史地位,这些见解也都是相当真切而有意义的。

三、宽广的学术视野与纵横错综的比较方法。

自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以来,曾朴的《孽海花》一直被定位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其实,鲁迅本人对《孽海花》的评价较高,既称之为“结构工巧,文采斐然”,复誉其人物刻画“亦极淋漓”,显然有别于《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那类作品。杨联芬则进一步将《孽海花》从“谴责小说”中提升出来,与李劫人的《死水微澜》三部曲放在一起,定位为“现代长篇历史小说”。她认为:“《孽海花》历史叙事的现代性体现在:它摆脱了一般历史小说以重大历史事件或重要历史人物为中心的模式,不是演义‘正史’,而是展现一种由世俗生活构成的‘风俗史’;它塑造的人物,是一种可能更多借助于虚构的,而且在道德品性、行为方式、经历和业绩上都不带崇高色彩的‘非英雄’。”这和李劫人采用“把实际存在的历史变成艺术的具文”的方法具有一致性。因而,在作者看来,“中国现代长篇历史小说的开拓者,应当是曾朴,而完成者,是李劫人”。

杨联芬从“风俗史”角度对“现代长篇历史小说”所作的界定,也许会在学术界引起某些不同意见。因为,最具有“风俗史”色彩的巴尔扎克的长篇系列小说《人间喜剧》,至今未见有人称之为“历史小说”;作为历史小说,自不免与“重大历史事件”或“重要历史人物”有一定的关联。但是,即便现代历史小说的定义及文字表述尚待完善,我们仍不能不承认本书作者有关曾朴《孽海花》和李劫人《死水微澜》

三部曲的见解,不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且是颇为精当的。《孽海花》的确“透露着现代审美意识的新鲜气息”,也“是晚清小说中结构最具长篇小说有机性的一部”。同样,作者依据曾朴在法国文学方面的实际学养而作的下述判断,也是完全有道理的:“《孽海花》的‘历史小说’意识显然更多吸收了法国近代历史小说的叙事观念,即以包罗万象的世态风俗描绘展示时代的风云变幻与社会历史进程,而在女主人公的刻画和审美评价及道德评价上,明显与传统小说的女性观不同,体现着以雨果为代表的法国浪漫派文学(似乎又不限于浪漫派文学——引者)的人文精神。”“《孽海花》的可贵,正在于它的‘出格’。作者几乎完全摆脱了传统道德观念和传统小说的善恶模式,向读者昭示:金雯青的窝囊、无能,恰恰反映了人性中非理性力量的强大;而傅彩云感人的美丽与情欲、她‘磊落’的淫荡,都令人想到法国文学从莫里哀到雨果,从巴尔扎克到福楼拜作品中那些风情万种而又道德越轨的女主人公。”“曾朴的《孽海花》因为深入和生动地描绘了傅彩云、金雯青这样一类历史进程中的‘俗人俗物’,描绘了他们真实的人性和他们很难用‘善’‘恶’进行衡量的道德行为,及由他们的生活所联系起的千姿百态的世态人生,使这部小说显得那样元气淋漓(此四字为引者特别欣赏,故标以着重号——引者)。几乎是在三十年后,新文学领域才又出现了李劫人《死水微澜》、《暴风雨前》这样充满现代历史意识和浪漫诗情、结构恢弘的‘风俗史’。郁达夫称曾朴为‘中国二十世纪所产生的诸新文学家中’‘一位最大的先驱者’,‘中国新旧文学交替时代的一道大桥梁’,是不过分的。”在对《死水微澜》中罗歪嘴与蔡大嫂以及《暴风雨前》中郝香芸、武大嫂等形象作了相当深入的分析之后,杨联芬也说:“这些地方,使我们感受到,由深厚人文精神支持的法国文学的博大与宽容,给予了李劫人超越的气度,‘道德’的评价在李劫人笔下退隐,人性的真与善,上升为‘美’。”这同样是说到了点子上的批评。作者的这些精彩论断,建基于中法两个国家以及中国不同时期文学纵横错综的比较之上,显示了学术视野的相对宽广。它与前述两个特点融合到一起,体现了作者不一般的功

力。相信本书读者读到这些地方,都会与我一样产生同感,并给予赞赏的。

最后,我还想借此机会就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简要地谈些看法。由于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一些文章中关注到中国文学的现代化问题(1981年的《鲁迅小说的历史地位》一文就从文学现代化的角度考察了鲁迅小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一书的作者们,曾称我为“最早提出”以“现代化”视角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人,此后并在海峡两岸的有关报刊上引起过人们的注意和讨论^①。其实,那时我还来不及就这个专门问题系统表达自己的意见。当初我关注它,只是看到中国现代文学在发展中确实存在这样一条贯穿始终的线索;我以为这条客观存在的线索,比长期以来我们运用的“反帝反封建”这一主观的政治视角要恰当得多,完全可以取代后者。我也赞成作为思潮——而不是仅仅作为因素——的“现代化”和“现代性”,应从甲午战败之后算起。它作为一种新的质素,对此后中国文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无论在文学的理念以及作品的内容和形式方面),构成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显著标志,虽然“现代化”或“现代性”绝非衡量文学成就的惟一根据。此其一。其二,文学的现代化或现代性,绝不可与现代主义文学划等号。现代主义文学只是文学现代化或现代性的一种,除此之外,现代文学还有写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等多种形态,它的道路应该是宽广的。欧洲文学史上虽然历时地存在过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写实主义与自然主义、现代主义诸种文学,但如果用物种进化的观点来看待它们,以为后起的必然比早先的进步与优越,那恐怕是一种很大的误解或叫做庸俗的理解。文学上的多元共存(或曰共时性),不仅是二十世纪中国的现实,也是欧美许多国家的现实,而且终将是二十一世纪全球的现实。

^① 见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所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一书。台湾学生书局1988年出版的龚鹏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之解析》一书曾引用并看重这一材料。河北省《文论报》亦曾刊载文章就此进行讨论。

其三,自从科学、民主、个性主义、社会主义等现代思潮在中国兴起,几乎同时或稍后,就有其对立面——批判“现代性”的思潮(即后来被称为“后现代”的思潮)出现——例如梁启超 1920 年的《欧游心影录》。在我看来,所谓“后现代”,其实只是对“现代”的反思、纠偏和补充,它是“现代”的伴生物,却永远构成不了一个独立的时代。其四,“现代性”在器物层面与思想文化层面完全可能互相悖离。物质生产最先进、最现代化的国家如果受反现代、反人文精神的霸权主义思想影响而不加以遏制,终将会对全球构成极大危险。中国二十世纪在文化思想史上获得的巨大进步,正体现在“五四”之后整整一代知识分子摆脱和告别了王韬、康有为那种强国以称霸全球的思想。以上各点,是我近十年来早已想说而尚未能说出的一些粗略见解,这次因受到杨联芬女士著作的启发顺便作了表述,也许能大体代表我对文学现代性问题较完整的思考。其中必定有一些书生气的并不全面的想法,我也愿意得到有兴趣研究此问题的朋友们的指正。

二〇〇三年五月二十一日

写毕于上海奥林匹克花园

目 录

序.....	严家炎(1)
绪 论 现代性——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主潮.....	(1)
第一章 在悖论与调和中建立文学的“现代”平台	(17)
一、理论悖谬与时代需求:晚清新文学运动的意义	(18)
晚清新小说运动的非主流性与非文学性——歪打正着:小说成为主流——“西方典范”意识在晚清形成	
二、晚清文人的边缘化与现代审美观念的萌生	(28)
边缘文人与“游戏说”——《小说林》的艺术论——王国维对游戏说的哲学整合——周氏兄弟的艺术观	
三、“人的文学”——“启蒙”与“艺术”的平衡	(42)
五四:双重目的与两难选择——“人的文学”:兼融启蒙与美的平台——人文主义:现代文学“现代性”的价值内涵——人道:惟一可能与艺术并行的道德	
第二章 “新”之所以然——晚清新小说论	(54)
一、晚清新小说审美空间的陌生化与“超验”性	(56)
从体裁开始的现代化——乌托邦与未来叙事——科学幻想——教育小说	
二、新小说文本与读者的新关系	(72)
古代小说:审美的公共狂欢性——新小说叙事者“政论家”与“新闻记者”的角色认同——新小说:社会公众舆论空间	

第三章 林纾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	(84)
一、“古文”与小说:林译对俗雅界域的打破	(85)
林译小说的契机——“西方”:小说与古文之间转化的可能性——林译与中国小说观念的历史性变迁	
二、林纾对西方小说的误读及意义	(95)
以古文经典诠释西方小说——用儒家道德解读西方人情——双重误读与林译小说的重构空间	
三、再论林纾与五四文坛	(108)
林译的“超文本”价值与五四作家的成长——历史的“误读”:回放林纾与五四的冲突——林纾的文化命运:牺牲在实质正义中	
第四章 作为“潜文本”的《域外小说集》	(127)
一、超前的现代性	(129)
“人道主义”与道德超前——主观的叙事——诗化的语言	
二、叙事的先锋性与审美的不实现	(136)
“现代”的选择与读者的拒绝——体验的先锋与语言的错位——非“小说”的叙述与审美的不实现	
三、《域外小说集》作为“潜文本”的意义	(143)
《点滴》、《空大鼓》:《域外小说集》的延伸——短篇小说:现代小说新范式——“抒情诗的小说”:现代小说美学范畴	
四、鲁迅小说的诗化倾向	(150)
诗化叙事与现代意识——散文化:追求平淡与含蓄——意境与音乐:承载深邃情思	
第五章 晚清-五四文学的“国民性”焦虑	(157)
一、“国民性”概念的由来及晚清的国民性批判理论	(158)
晚清“国家”与“国民”概念的出现——严复批判国民性	

思想的理论基础——福泽谕吉及日本国民性理论对中国的影响——梁启超的国民性理论与国民性改造方案——五四时期国民性话语走向的分歧	
二、晚清新小说与国民性母题的形成	(177)
刘鹗及“病”、“疗救”集体意象的形成——寓言性讽刺： 晚清小说国民性表现的荒诞特征——《文明小史》：广 泛的国民性讽刺——苏曼殊改写雨果《惨世界》与国民 性批判——《孽海花》对传统精英文化的批判	
三、五四文学：国民性的焦虑与对抗	(191)
五四国民性话语与西方的关系——周氏兄弟的国民性 观念——鲁迅国民性话语的内在矛盾——老舍的国民 性批判：对西方的认同与反抗	
四、国民性命题的再讨论	(211)
西方话语的横移——国民性理论的逻辑假设性——国 民性理论的现实合理性	
第六章 苏曼殊与五四浪漫文学	(218)
一、苏曼殊与浪漫主义	(219)
苏曼殊、五四与感伤主义——拜伦、雪莱与中国浪漫 派——诗文与人格一致的浪漫气质	
二、苏曼殊小说的浪漫抒情	(233)
苏曼殊一般小说的特征——《断鸿零雁记》：中国小说 叙事的革命——《断鸿零雁记》的浪漫抒情与自我表现	
三、逃禅与脱俗：苏曼殊的宗教信仰问题	(245)
苏曼殊与宗教的关系——禅耶？道耶？——苏曼殊宗 教选择的浪漫主义本质	
第七章 曾朴、李劫人与长篇历史小说的转型	(254)
一、“小说”与“历史”的两难：吴趼人、林纾历史小说的 过渡性	(255)

吴趼人之俗:追求“信史”与“小说”的调和——林纾之雅:“史”与“小说”的疏离

二、风俗史与非英雄:曾朴《孽海花》历史叙事的

现代性 (260)

法国近代小说:曾朴小说的摹本——“谴责小说”概念的遮蔽性与胡适的偏见——章回体的沿用与突破——世俗化与风俗史——人文精神与现代意识

三、李劫人:现代历史小说的完成者 (279)

另一类现实主义——大河小说的史诗形态——“风俗”的文化与历史含量——真实性与审美评价的超越性

主要参考文献 (295)

人名索引 (303)

文献索引 (310)

跋 (318)

绪论 现代性——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主潮

中国文学“现代性”产生的时期,显然是在晚清的最后阶段,即中国思想界大规模引进西方思想文化学说、开展启蒙的19世纪最后几年。

不少学界同人主张,寻找中国现代思想的开端,应当从魏源、龚自珍开始。但是,如果我们所寻求的现代性,不仅仅是从“因素”着眼,而是以更广泛的“思潮”为标志,那么,回顾中国海通以来思想文化的形态,就不难发现,在甲午战争及《马关条约》前后,确实形成了分水岭。中国知识界对西方文化的态度,中国思想文化的基本术语,在此前后显然有较大不同,而这关系到中国知识界对中国社会现代模式的预设。

19世纪中叶,中国与日本在几乎同时受到西方侵略时开始了对西方文明的研究和模仿。但中国对西方的模仿,止于坚船利炮、声光电化等“器物”层面,中国的现代化目标,仅仅是“师夷长技以制夷”。1894年至1895年甲午一役,洋务派苦心经营多年的强大的北洋水师,瞬间灰飞烟灭,洋务运动遭到致命打击,清廷宗室保守气焰甚嚣尘上,现代化一时成为过街老鼠,改革派官僚知识分子的现代化选择遭受重大挫折。严重的危机迫使维新知识分子思索现代化的新路径,中国的历史也因此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思想启蒙时代。

晚清先锋知识分子认识到,西方文明作为一个由器物到精神的统一形态,实在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从物质文化到精神文化向西方看齐,是中国谋求独立富强所不可摆脱的命运,西方的政治、法律、思想学说被视为拯救国家的良药。在康有为等向朝廷激烈上书、鼓吹政

治改革的同时,严复、梁启超等则意识到开民智、新民德、鼓民力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本”,改造国民精神的“新民”运动,遂成为思想启蒙的重心^①。自此,一系列以传播西学、讨论变革、倡导启蒙为宗旨的思想文化阵地纷纷涌现:1895年,北京和上海强学会先后成立;1896年,梁启超、黄遵宪、汪康年在上海创办《时务报》;1897年,梁启超在上海创办大同书局,严复等在天津出版《国闻报》及《国闻汇编》。1898至1899年,严复对中国思想界影响最大的两部译著《天演论》和《群己权界论》^②出版;与此同时,林纾翻译的首部西方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问世。西方现代文化、思想及其价值观,作为“文明”即现代性的范本,被介绍到中国;输入新学,开启民智,成为维新思想界寻求的中国社会救亡图存的前提。

就是在这样一种充满深重忧患而又热烈期待的思想启蒙运动中,中国文学开始了它的现代转型。从“诗界革命”、“新文体”到“小说界革命”,清末一系列文学革新,都是为配合思想启蒙而产生的。文学,尤其是受众最多的小说,被用来作为思想启蒙的利器;而小说,又藉着这场士大夫广泛参与、目标崇高的思想运动,结束了它流播于坊间的边缘时代,获得了主流文学的地位,并以对西方文学的广泛借鉴,完成了中国文学现代性转化的基础准备。

① 1895年严复在《原强》中首次提出器物文明只是文明之“标”而非“本”,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三者才是强国之本。此观点在稍后梁启超的系列“新民说”中得到系统阐述,成为晚清思想启蒙运动的主导思想。

② 《天演论》1897年开始部分在严复参与主办的《国闻汇编》中刊登,次年木刻本出版。此书译自英国赫胥黎(Thomas H. Huxley)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笔记》(Evolution & Ethics and Other Essays),实际只译了赫氏原著中的“进化论”,舍弃了“伦理学”部分,而后者是赫胥黎此书的思想重心,旨在以人类伦理规范竞争,强调人类竞争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界的区别。严复的误读,是适应当时面临亡国而社会普遍愚昧的中国社会现实,为启蒙需求而有意为之的。果然,《天演论》对中国社会的变革产生了巨大影响,进化论也成为20世纪中国现代文化中一个重要的思想观念。《群己权界论》译自约翰·穆勒(今译弥尔)(John Mill)的《自由论》(On Liberty),1899年出版。

“现代性”是一个源自西方的概念,与“现代化”一样,体现着 20 世纪中国和东方其他民族国家被西方强行拖入“全球化”时的共同境遇。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历史,是在不断抵御外侮的抗争中,为强国保种而艰难追求现代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封建专制皇权及儒家道统的“神魅”被逐渐削弱以至消解,科举制取消,现代民族国家模式(共和制)得以建立,工业文明和市场经济逐渐取代传统自给自足的农业文明而成为社会经济的主导模式,科学主义、民主意识、人文主义被推为现代精神得到普遍推崇。然而这个过程是被动的,相对于西方来说是后发的、模仿的。19 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对中国的掠夺、侵蚀、欺侮,中西民族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中国现代化启动的“不情愿”,中国传统文化心理与制度的复杂性,都决定了中国的现代性既是以西方为范本的,同时又具有它自身的复杂、艰难与曲折。

“现代性”作为一种跨越民族国家界限的世界性现象,它的存在要比这个概念在世界范围内普遍使用早得多^①。因此我们不必因为它的西方和“后现代”背景,而将它与其他流行术语一样作为又一种泡沫化的新名词加以轻视。其实,晚清的“西学”、“新学”、“文明”,五四的“欧化”、“现代”,以及 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使用频率很高的“现代化”等概念,所指涉的,都是现代性。

从现代性的角度考察文学的历史进程和形态变迁,曾经是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摆脱极左政治模式的一个重大策略,在“还原”中国现代文学启蒙主义的性质上,取得了重大突破。1981 年,严家炎用“现代化”一词概括鲁迅小说的价值^②,不但突破了鲁迅研究长期以来的政治话语窠臼,而且将现代性视野引入了中国现代文学的

① 现代性概念产生于公认的“现代”时间(17 世纪)之后,而它作为一种通行的概念被广泛运用于西方哲学、经济学、伦理学和文学艺术领域,则是 19 世纪以后的事。在中国大陆,“现代性”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伴随着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被介绍,作为与后现代主义相对立的概念而在汉语中使用的。

② 严家炎《鲁迅小说的历史地位——论〈呐喊〉〈彷徨〉对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贡献》,见严家炎《求实集》第 77—101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3 年版。